

“大同”为何与“天下”紧密相连

董振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中写道：“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如中国古代就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就有很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求大同”思想，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彰显着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天下理念、为解决人类相关问题提供着伟大的中国智慧。

中华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主张求同存异的和谐发展理念，认为万物相辅相成、和实生物。这种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

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中华民族一直是富于“天下”观念的，主张行大道，谋大同，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行大道于天下，就是要以天下观天下，就是要站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天下高度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以此则天下平、大同至。

大同的和谐理念，主张建设各美其美的和谐世界。为世界谋大同，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从不同的意义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进行过描绘。从《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大同之梦，到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平静自得的生活场景，再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大同”理想，孙中山发出的“天下为公”的呐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管社会如何进步，文化如何发展，骨子里始终有着对大同世界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天下情怀一方面体现为以和为贵——中国自古就崇尚和平，主张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睦共处，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另一个方面则体现为合作共赢——中国从不主张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始终倡导兼容并蓄的理念，并切身践行这些理念，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共享，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世界谋大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逻辑必然，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注世界发展和人类事业进步的天下情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和博大胸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法国汉学发展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阐释与价值彰显

蒲真真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汉学的重要支脉，自17世纪耶稣会士入华起，便以其独特的知识谱系与方法论自觉，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译介与阐释。从雷慕沙、儒莲的古典文本考释，到沙畹、伯希和的考古与文献批判，再到葛兰言、谢和耐对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切入，法国汉学在翻译、注释、比较与批评等多重操作中，不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秩序、治道治理、审美境界与宇宙观念的深层结构。

法国专业汉学的制度化起点，被学术界普遍追溯至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的设立，这一事件标志着汉学在西方首次作为独立学科获得制度性承认。年仅27岁的雷慕沙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汉语，1813年完成医学博士论文《舌诊研究》，将医学志趣与汉语研究融为一体。雷慕沙以及其后继者儒莲等人所建立的学院派汉学与之前传教士所主导的汉学研究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多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在翻译中国的古籍时也有较强的目的性，对于中国古籍也有选择性地进行了翻译和再创造，而专业的汉学则更注重学术研究，以一种中立的态度来解读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变使得中国知识体系能够以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呈现，脱离了早期汉学中常见的带有先入为主的理解。另外，雷慕沙也发现了中文文献中保存的中印思想交流的珍贵资料，在他的研究

基础上，中印古代文化交流成了西方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这个学术框架下，“道”这个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被翻译和解读，其实践和理论上的跨文化传播形成了。其中体现的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的阐释潜力，在西方的知识框架下得到了挖掘并逐渐深入了解。

19世纪，沙畹继承了法国汉学传统，在考古学、碑刻、绘画以及唐朝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往来等各个领域都有涉足，最著名的学术成果之一是《史记》的法译版，这也是西方一些国家研究汉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历史的经典。沙畹的学术研究是充满张力的，一方面重视对中文文献的正确理解和考证，另一方面不断拓展汉学的范围，把西域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内容都纳入汉学研究的范围，这种拓展本身就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同中亚、南亚乃至整个欧洲进行交流的过程性存在。

在沙畹后学中，伯希和是一个具有典型争议的汉学家。1908年，伯希和探险队到达敦煌，在洞窟里绘制地图、拍摄照片，进行编号、写日记等一系列工作，这些系统性的调查为后来解读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变使得中国知识体系能够以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呈现，脱离了早期汉学中常见的带有先入为主的理解。另外，雷慕沙也发现了中文文献中保存的中印思想交流的珍贵资料，在他的研究

品，这一行为在当时便已引发争议。尽管他的中译本著作至今仍是绕不开的参考文献，但学界在援引其研究时，亦无法回避对他“探险”背后的追问。

在语言学的传统之外，葛兰言开拓了另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以社会学与人类学为方法，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逻辑。作为西方汉学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葛兰言深受涂尔干学派的影响，主张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的制度与习俗，他依托《诗经》《礼记》等经典文献，系统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演变。通过分析节庆、礼俗与婚姻行为中的交换模式，葛兰言揭示了这些看似分散的民间活动背后严谨的社会功能，指出礼乐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整合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自身固有的社会组织智慧。葛兰言同样最早提出“关联性”思维来归纳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征，认为中国文明把天地、自然、宇宙放在一个客观又综合的整体系统里。这一概括虽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但其参照系指向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不同于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整体认知模式，以外部视角激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再认识，证明了古代中国的制度与观念同样具有高度的理论可理解性与比较研究价值。

20世纪法国汉学的重要转向，是从纯粹语文学研究走向对中国文化、思想、社会的整体性剖析。谢和耐作为戴密微的弟子，将社会经济史作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揭示了宋

代以降中国社会内在的变迁与活力。汪德迈则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入手，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儒学、哲学史与思想史，摒弃用西方概念套用中国研究的模式，在中国思想文化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领域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法兰西学院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60年代还增设了“西域史讲座”，与“汉学讲座”形成互补，并且汉学研究涵盖从17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医理论与针灸技术，到20世纪后期法国汉学家对《黄帝内经》的翻译与阐释，法国学者们在医学、艺术、科技史等领域的持续探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不断激发新的意义。

回溯法国汉学从朦胧初识到精深钻研的数百载历程，这场对话始于对东方文化的猎奇与误读，但在学术的真诚与严谨中，在西方学术语言和方法论所设定的知识场域中，不断地翻译、注释、考证、阐释和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面向，法国汉学家逐步走向对中华文明内核的尊重与理解。法国汉学的学术史，本质上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早期便被纳入世界学术图景的历史，这一历史所证明的，从来都不是他者的评判，而是中华文化自身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本文系2026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年鉴学派视域下法国百年汉学的中国社会叙事谱系研究（1925—2025）”的成果，项目编号：2026YB0156〕

深耕红色沃土 守护精神根脉

——以江西省九江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与发展为例

陈 谦

革命文物是承载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的实物载体，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革命精神的鲜活教材。江西省九江市坚持立足长远、求真务实，在抓实重点革命文物保护的同时，聚焦低级别文物管护难题，积极探索创新，走出一条全域统筹、分级施策、保护提质、活化增效、传承致远的实践路径，守护红色根脉，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强化责任：立足长远精准施策，创新分级管护实践路径

九江市将革命文物保护作为打基础、利长远的文化工程，以系统化举措筑牢文物安全屏障，尤其针对量大面广的低级别文物，探索形成差异化保护模式。

摸清底数、建档在册是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建立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401件台账。实现一文物一档案、全域动态管控。43处不可移动文物、22件(套)可移动文物成功入选省级革命文物名录。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九江创新建立文物梯度升格培育机制，对具备历史价值的低级别遗存分批培育、逐级申报。

压实责任、分类管护，构建全域安全防线。全市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全面推行文物安全责任人公示制度。在管护模式上大胆创新，对省级以上重点文物配备专职人员养护；对乡村低级别文物推行镇村网格

化管护机制，吸纳村干部、网格员、老党员组建业余管护队伍，下沉到村组。全面落实文物“四有”建设标准，既完善重点文保单位保护设施，也为乡村小微红色遗存统一设置简易保护标识，并将文物安全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以刚性约束压实保护责任。

直面短板、分类破题，探索低级别文物保护新路径。针对低级别文物资金不足、产权复杂、修缮不规范等共性难题，九江坚持全域均衡发展，采取一套组合举措。资金保障上，优化财政分配结构，单列专项经费用于低级别文物抢险养护，统筹老区建设资金、政府债券、乡村文旅资金，并引导乡贤、企业、志愿者参与，构建“财政主导、社会补充”的多元投入体系。产权管理上区分私有、集体两类主体，推行“协议保护、以补代养”“产权置换、有偿收储”等柔性模式，将集体文物保护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修缮工作坚守“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创新推行一处一策简易修缮导则，杜绝过度改造，同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帮扶，破解基层“不会修、不敢修”难题。依托乡村阵地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不断提升群众自主保护意识。

坚持项目引领，稳步改善文物保存条件。全市统筹推进重点工程与小微修缮项目，画坪湘鄂赣省委旧址群、新四军都昌留守处旧址等重点项目有序实施。同步推进低级别濒危文物小型抢救项目，形成“在建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项目格局，并提前启动

2027年项目申报。2025年，全市统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资金727.84万元，为全域革命文物长效保护提供坚实支撑。

活化利用：坚持惠民务实导向，创新红色资源转化路径

九江市树立“保护为了人民、利用服务人民”的正确政绩观，摒弃同质化打造、过度商业化开发，立足资源禀赋创新活化模式，推动革命文物从“静态存放”转向“活态赋能”，最大化释放红色文化综合价值。

创新宣教载体，丰富红色传播形式。围绕重大主题与时间节点，打造特色红色文化活动品牌，举办“英雄回家”弘扬伟大抗洪精神系列活动，通过史料捐赠、座谈宣讲、实地访访等形式传承精神力量。依托抗洪文物打造的讲解项目《一张草图里的钢铁长城》获评全国第二届革命文物讲解大赛专业组精品奖，相关沉浸式研学课程被纳入全市红色教育重点项目。各革命场馆完成展陈升级，运用多媒体、场景复原等现代技术提升观展体验，结合抗战胜利80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等节点推出主题展览24场，形成“基本陈列+专题特展”融合模式。针对乡村零散低级别点位，创新开展流动宣讲、乡村红色故事会，让乡土红色故事走进寻常百姓家。

创新研学模式，拓展红色育人阵地。整合全域红色资源，精心打造“红心少年”革命文物主题游径，串联城市展馆、乡镇旧址、乡村小微红色

点位，构建全域贯通、层次丰富的红色研学网络。彭泽、修水红军村依托本地遗存，成功入选省级红色研学线路。同时加强讲解、管护队伍专业化培训，推动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基层。

传承创新：秉持久久为功理念，探索长效发展路径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九江市摒弃急功近利思维，以长效规划推动红色文化代代传承，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经过多年深耕，九江已形成普查建档、分级管护、多元投入、全域利用的完整工作体系，红色文化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市域内低级别文物数量多、分布散，产权协调、长效运维、持续活化等问题仍是工作难点，保护传承之路仍需不断探索。

面向未来，九江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全域保护利用体系。一是健全分级保护机制，细化低级别文物修缮、管护、利用标准，持续推进文物梯度培育提升，补齐基层工作短板。二是拓宽资金投入渠道，打造社会力量参与模式，构建更加稳固的多元保障体系。三是优化融合发展路径，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持续挖掘红色资源时代内涵，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九江红色力量。

（作者系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九江市博物馆馆长）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既推动着全民阅读的进程，又精准对接了更多人对文化的深层次需求，同时也拓展和深化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更重要的是，它引领公共图书馆从单一借阅模式，向服务全年龄段的文化中心转型。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推进，公共图书馆迎来了高质量、高标准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需肩负的重要使命。

公共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服务的价值与意义

国际图联《婴幼儿图书馆服务指南》中提到，面向婴幼儿群体的图书馆服务至关重要。早期大脑发育研究表明：对婴幼儿说话、唱歌及阅读有助于他们语言能力的发展。婴幼儿身处的环境对早期阅读能力的培养起着极大的作用。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旨在激发婴幼儿的阅读兴趣，培育其良好阅读习惯，这对婴幼儿个体将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海南省统计局官网发布的《2024年全省常住人口主要数据公报》，当年“全省出生人口9.80万人，比上年增加0.20万人；出生率9.37‰，比上年上升0.09个百分点”。随着2021年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政府为鼓励生育推出多项支持政策，未来若干年内婴幼儿的人口数量将会有所增长。这使海南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国家重视全民阅读，当前我国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公共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中取得显著成就，然而不少公共图书馆服务存在年龄限制，将不具备自主阅读能力的婴幼儿排除在外。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是健全阅读服务体系、推动服务从分龄分众向全龄化拓展的一项创新举措。

海南正加快建设自贸港，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有利于提升海南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更加浓郁的书香文化氛围。

婴幼儿阅读服务现状管窥

为了了解公共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服务现状，笔者于2025年10月通过网络调查法，对我国32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和33所国家一级少年儿童图书馆进行调查。通过访问其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及微博，获取了相关信息并进行了统计分析。调查显示，在32所省级公共图书馆中，设有婴幼儿阅览区的有6所(占18.75%)，开展相关阅读推广活动的有4所(占12.5%)，两者兼有的仅2所(占6.25%)；而在33所国家一级少年儿童图书馆中，三项对应数据分别为10所(30.3%)、6所(18.18%)和5所(15.1%)。该统计说明，婴幼儿阅读服务已得到一些省级图书馆和国家一级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重视，且后者的服务开展更为深入和全面。

和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婴幼儿阅读服务起步较晚，但也不乏尝试。比如，江苏省苏州图书馆结合自身情况，推出了“悦读宝贝计划”，向新生儿赠送“阅读大礼包”，还有上海市浦东图书馆的“悦读起步”计划、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的“婴幼儿读书会”、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等也纷纷开始了“阅读大礼包”的赠送。由此可见，一些地市、县级图书馆也开始重视并推广婴幼儿阅读服务。

目前海南省正积极推动全民阅读，《2025年海南省全民阅读工作方案》提出要“为少年儿童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阅读活动，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创造力”。海南省注重儿童阅读，公共图书馆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阅读服务，但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只针对3岁以下儿童，对0—3岁婴幼儿阅读缺乏足够的重视，开展婴幼儿阅读服务的还不多，设有亲子阅读空间并开展幼儿阅读推广活动的就更少了。

虽然海南一些公共图书馆在婴幼儿阅读服务的探索上迈出重要一步，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在阅读环境上，缺少专门的婴幼儿阅读空间；在馆藏建设方面，分级阅读资源不完善，且种类较为单一；在活动策划上，缺乏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在人才队伍方面，则缺少专业的婴幼儿馆员。

婴幼儿阅读服务策略

一是加强引导，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引领作用，制定和完善婴幼儿阅读发展相关规划，倡导“阅读从0开始”的社会风气。同时进一步摸清现实需要，为婴幼儿阅读服务提供重要保障，适当提升公共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服务的规模 and 水平。

二是注重阅读环境创设，打造特色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可以为婴幼儿创设一个安全舒适的阅读环境。良好的阅读环境有利于婴幼儿对阅读产生兴趣。阅读空间的设计要符合婴幼儿生长发育的特征，考虑安全性，注重每个细节的设计，杜绝

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服务研究

苏春思

安全隐患。同时融合海南本土文化，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婴幼儿阅读空间。比如，可以借鉴海南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的设计，该馆分别以“海洋”“热带雨林”“自贸港”“航天”为主题，巧妙地融合了海南本地的生态与文化元素，展示海南的独特魅力，营造别具特色的阅读氛围。阅读空间除了配备母婴室，也可配备父婴室。这不仅体现出公共图书馆在阅读空间上创新拓展，也体现着对家庭育儿需求

的温情回应。

三是完善分级阅读，丰富馆藏资源。首先，不同年龄的孩子在心智等方面的不同表现会比较明显，公共图书馆应根据婴幼儿各个年龄段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构建分级阅读体系，全方位满足婴幼儿阅读需求。比如，对0—1岁婴幼儿，可配置黑白卡、彩色卡、触摸书、布书、洞洞书、立体书、撕不烂书等色彩鲜艳的图书；对1—2岁的婴幼儿，可配置板书和认知游戏书、儿歌书，以及互动性强、句式重复的故事书。其次，公共图书馆可引进多种类型图书，开发丰富多彩的本地特色绘本。邀请本地插画师制作反映本土文化的绘本作品。比如，把海南非遗黎锦技艺制作成触摸书或立体书，把琼剧等本土戏曲的相关作品制作成漫画卡通形式的发声书等。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创建多种类型绘本，在促进孩子快乐阅读的同时，也传播了传统文化。最后，公共图书馆可引入多种互动式的阅读工具，比如点读笔、绘本机器人、故事机等。这些互动阅读工具能让婴幼儿对阅读产生极大兴趣。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中提到：“0—3岁的婴幼儿应当不接触任何形式的视屏类产品。”因此，在选择互动阅读工具时，应禁止引进视屏类产品。

四是寻求社会力量，加强合作。公共图书馆向馆外寻求合作，让政府、市场、社会多种力量共同参与。这不仅有利于资源融合、提高配置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开放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对此，一些地方已有相关经验，比如，2024年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联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共同主办了“宝贝阅读计划”。根据海南省情况，海南省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已依托妇幼保健机构、村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相关场所建立亲子小屋，已覆盖多个市县。公共图书馆可联合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在亲子小屋的基础上创建婴幼儿阅览室，打造新型阅读空间，构建多种主题的公共服务模式。这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还可拓展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随着亲子小屋覆盖村居(社区)，婴幼儿阅读服务也可实现更广泛覆盖，这也更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五是培养专业的服务婴幼儿阅读的馆员，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面向婴幼儿服务的馆员除了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之外，还应接受婴幼儿心理发展的专业培训。目前国内已有少数高校开设儿童图书馆学相关课程，这给图书馆婴幼儿服务提供了一定的专业人员保障。服务婴幼儿阅读的馆员需要具备多方面服务技能，能讲故事和开展阅读活动等。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深入建设，服务婴幼儿阅读的馆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能接待不同语种的读者。

综上所述，这一系列创新策略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服务效果提升。这不仅能使婴幼儿个体终身受益，更能有力推动全民阅读，为构建书香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海南省图书馆）